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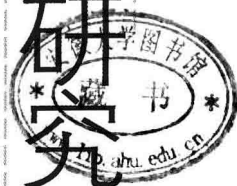
民国政治
结构变动中的
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

陈征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
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

陈征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 / 陈征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61 - 0093 - 6

I. ①民… II. ①陈… III. ①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研究—
云南省—民国 IV. ①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772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依 然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87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选择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学术的目的和意义。关于民国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在地方史中尚未见系统的研究，该课题的提出并完成，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笔者亦尝试对政治学某些相关概念的经验检视，如关于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近代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表达等，力图通过一种具体的、结合经验的研究，以从理论层面揭示出其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潜力与局限，而这同时也就赋予了该研究理论上的学术价值意义。其次，从实践的层面，通过对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研究，揭示其时地处边远、多民族集聚省份在政治动荡年代中的地方特性及国家观念特征，由于国家动乱时期往往能较充分地显示出作为地方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底线，这对当下实施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如何兼顾各方利益、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谋求社会和谐发展等思虑及政策选择，特别是针对类似云南这样的多民族集聚的地区，或许会具有某种实际参考的价值意义。

当然，这一选题的提出，更重要的还与笔者既往的学术积累有关，直接动因则起于笔者前期《云南工业史》一书撰写过程中，对历史上云南地方与皇朝中央关系的兴趣与探究。历史上早于秦、汉时期，云南就已经处于皇朝中央的内地化经略之中，元、明以后，随着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不仅使云南上层各统治集团均纳入到了皇朝中央大一统集权统治格局之中，也使云南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的关系日趋紧密。尽管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同期云南亦发生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族起义），已逐渐使清皇朝中央在政治、军事与财政的集权遭到削弱，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强势依然存在。其时云南虽僻处偏远，但在政治、军事及经济等方面，与内地各省一样，总体上仍处于皇朝中央的掌

控之中，其控制与被控制的属性并未改变。但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肇造所带来的已是不同于往昔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先是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效仿，国体变更引致了社会各种政治势力的迅速崛起，传统皇权制度的专制政体被彻底颠覆；1915年的护国倒袁运动，则演变成南北政局的分裂，中央统一政权的失控，使一时之间各地大小军阀纷起。民国初期这种社会政治的失序，从局部看，由于其时西南各省政权基本游离于中央的控制，地方军阀的长年争权逐利、抢夺地盘等，云南亦长期处于战乱与纷争当中，真可谓是民不聊生！1925年以后的国民革命，尽管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各省自立为王的状况并未根本改观，特别是云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也使其相对独立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45年。总之，民国时期云南的地方与中央关系，具有着既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他省的显著特征。分析其变迁演化过程，揭示其初期由对西方政治民主的简单效仿所引致的大范围、长时期的社会地方动乱，以及在传统中央威权重建中，云南地方势力回归一统的心历路程及波折，管中窥豹，不仅为国人展现了近代以来我国政治民主变革艰难曲折的一面，也于此或可为后人提供一点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国内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其对社会相关联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仍极为薄弱。尽管80年代以后，随着早期现代化话语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崭露头角，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央政府政策变更与地方社会发展关系方面的著述，主要者如外国学者费正清、邓嗣禹、费维恺、罗兹曼等有关译著，国内学者如章开沅、朱英、虞和平、王晓秋、周积明、周育民等的相关著述，但该类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对近代，特别是晚清的政治与经济政策选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革所进行的一种综合性研究。直接对民国时期地方与中央关系问题进行过研究的，国外学者如费正清等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亦有专章论及其时中央政权与各省之关系，大陆学者如李国忠的《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等，但也系一种宏观的概括性研究。另有如崔运武对晚清地方督抚的研究、邓正兵关于近代广东地方实力派的研究等，则主要是对地方的单向度研究，并不涉及对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整体把握。

云南地方史涉及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研究方面，较早的主要有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关于云南地方历届政要的传记性研究，如台湾沈云龙主编的《唐继尧》、《会泽唐氏荣衰录》和《会泽笔记》；由香港出版、江南撰写的《龙云传》；中国内地有谢本书的《蔡锷传》、《龙云传》和《卢汉传》，缪云台的《缪云台回忆录》，文思主编的《我所知道的卢汉》，以及晚近的潘先

林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一书等，上述成果，无疑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有价值的史料参考基础。90年代前后台湾学者曾进行过关于“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之专题讨论会，并出版有会议论文集，涉及云南的有杨维真《从财政角度看云南与中央的关系（1911—1945）》一文；另有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和《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两书，这些都是与本研究较为接近的论题，很显然，其作为参考与相互佐证的价值亦不可忽视。而2000年前后，适应国内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动向，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选择云南早期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环境条件，其早期工业化的发轫晚于全国，大致可以1910年滇越铁路的建成通车为起点，因而在其专著《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行为及作用亦成为该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后则有本人近期完成的《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云南发生社会变迁的政治与经济背景所作出的进一步探究，这两项学术成果无疑为笔者进行本项目的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民国初年中央集权分化与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1)
一 民国初年的国体之争与南北政治分野	(2)
(一) 国体、政体与护国运动	(2)
(二) 护国运动的意义及南北政治分裂后果	(9)
二 民治基础酝酿中的地方与中央关系	(13)
(一) 护国运动之后地方自治的酝酿	(13)
(二) 省治、县治及地方与中央关系	(18)
三 唐继尧与民初政治:激进民权与政局分裂	(28)
(一)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对西南政局分裂之无奈	(31)
(二) 南北议和与西南联省自治之倡行	(37)
(三) 民国初年与争取民权并存的云南社会动乱后果	(46)
第二章 唐继尧时期云南与南北政府的依存关系	(51)
一 依托云南、面向西南的政治军事视野	(51)
(一) 政治上极力主张西南联为一体,以与北洋政府成抗衡之势	(52)
(二) 军事上凸显以川粤为屏障、“大云南”为根基的战略要图	(57)
(三) 地位上借助滇军在西南护法中的中坚作用	(64)
二 谋求北洋政府和国外势力相结合的国内政治均势	(71)
(一) 与北洋政府的行政往来和政治博弈	(71)
(二) 政治上对国外势力的依赖	(78)
三 唐继尧时期的云南地方财政支持体系	(84)

（一）国家税入的“正当”截留	（84）
（二）邻省税款之“合法”征缴	（88）
（三）以大锡、烟土收入为重的地方财政特色	（93）
（四）其他财政来源渠道	（96）

第三章 民国中央威权重建与云南地方政权更替

一 国内政局变动与唐继尧政治权势的衰微	（99）
（一）南方国民党中央集权统一势力的政治进取	（100）
（二）唐继尧地方自治权势的衰微	（103）
二 南京中央威权的重建及其统一实质	（111）
（一）借助苏俄及共产党人的军事威权重建	（112）
（二）以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党务整理与清党运动	（115）
（三）经济上以向地方利益妥协的方式获得形式统一之认可	（119）
三 云南地方势力争夺与龙云的政治崛起	（122）
（一）唐继尧倒台后的云南地方势力争夺	（122）
（二）云南内争及与邻省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关联	（125）
（三）倚重南京中央威权的龙云政治崛起	（131）

第四章 民国龙云地方独立政权的实质及与中央政务往来

一 龙云政权谋求地方自主的实质与限度	（145）
（一）龙云地方政权对国民党统一势力的追随	（145）
（二）民国龙云地方“独立”政权的意涵	（150）
（三）民族主义与地区民族集聚特点对龙云地方意识的制约	（156）
二 云南地方与中央的行政事务往来	（161）
（一）与内地步调一致的国民教育方针	（161）
（二）国民党党务在云南的推进与渗透	（164）
（三）中央对云南地方要政之审批及行政权限的扩展	（167）
（四）边境对外事务对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强化	（175）

第五章 龙云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的军事合作及其相互制约

一 龙云的追剿红军与地方自保	（183）
（一）龙云配合国民党中央追剿红军的政治动机	（183）
（二）龙云配合国民党中央追堵红军的成败得失	（190）

二 云南抗战出师及与中央的政治均势变化·····	(203)
(一) 基于爱国主义本能的抗战出师与地方力量动员·····	(203)
(二) 抗战内迁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之博弈·····	(208)
(三) 假滇边战事中央军的进入与政治均势变化·····	(217)
第六章 龙云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演变·····	(225)
一 战前形式统一、实质独立的云南地方财政体系 ·····	(225)
(一) 由中央与地方军事协作形成的云南财政拨款·····	(226)
(二) 云南实质独立的财政来源构成·····	(230)
二 抗战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财政分配关系的胶着状况·····	(241)
(一) 以抗战为契机中央经济势力渗入云南·····	(241)
(二) 云南地方对中央金融财政政策的抵制与适应·····	(252)
第七章 民国后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历史转折·····	(270)
一 蒋介石“运筹帷幄”与龙云重庆“就职”·····	(270)
(一)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酝酿·····	(270)
(二) 蒋介石为解决龙云在政治与军事上之部署·····	(275)
(三) “十·三”事件与龙云重庆就职·····	(282)
二 卢汉上台与南京中央政权的历史终结·····	(290)
(一) 过渡时期的李宗黄代主席·····	(291)
(二) 临危受命——危机四伏的卢汉政权·····	(295)
(三) 卢汉起义——国民政府统治的历史终结·····	(306)
结语·····	(327)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32)
后记·····	(338)

第一章

民国初年中央集权分化与 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民国开国之后，首先在政治上便呈一乱象，如孙中山 1923 年所言：“自民国二年至于五年，国内之革命战事，可统名之曰讨袁之役；自五年至于今，国内之革命战事，可统名之曰护法之役。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遗留之制度，不随以俱死，则民国之变乱，正无已时。”^①而之所以如此，就中或许还不仅仅因为“袁世凯所遗留之制度”这个单一诱因，^②从史料情况可以看出，其时人们对民国政体制度究竟应作何种选择以及对这种政体制度的不同理解，显然是导致出现政治分野和动乱的重要原因。有如研究指出：“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之所以现代国家的建设屡屡受挫，除了来自外部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清末以来，有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联邦制的构想始终没能销声匿迹，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联省自治’运动曾得到很多激进派人士的支持。对此，即使在今天还是毁誉参半。”^③很显然，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并建立民国后，其政治上的失序，除反帝制复辟外，亦有关于民国共和政体在实行宪政条件下的自治基础的争执，此争执则直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确立问题。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9 页。

② “袁世凯所遗留之制度”说到底也就是试图对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恢复，从欧洲（如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看，也都曾经历过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似乎是世界近代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演化方式。但于中国当时的情况，此显然只是阻挠社会进程或说是造成社会失序的一个方面原因。

③ 张允起：《宪政、理性与历史：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 页。

一 民国初年的国体之争与南北政治分野

（一）国体、政体与护国运动

近代中国国体问题的提出，一方面与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演化发展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更直接的诱因，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殖民侵略及国力日渐衰微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其时，眼睁睁看着作为亚洲邻国的日本随着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日益见长，以及1894年的中国甲午战败，时人亦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家政体制度的落后。如有研究指出：“清末，西方政治学说开始传入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已经言及英美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但是，当时的洋务派关心的是船坚炮利、‘科技’兴国，未尝留意于西方的思想观念及其政治制度。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当时的许多士人痛定思痛，迫切意识到彻底变法的必要。”^①而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就曾上书：“力陈外国政制的优点，详说中国局势的危殆，建议应速效法日本，实行改革。”^②而梁启超则从国家政体与国民素质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政制的弊端，使“其执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觉，不复知有世界大局，惟弥缝苟且以偷一日之安，务压制其民，以防乱萌，而国政之败坏萎弱，遂至不可收拾；其国民受压既久，消磨其敌忾之气，荡尽其独立不羁之气，以至养成不疼不痒今日之天下”，形成国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之特征。反之，“国政修，民气强，而国民之文明幸福，遂随之而日进”^③。而就在那一时期，以康梁为首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阶层曾发起了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戊戌变法运动。只是当时以“康梁诸人维新变法的思想和拟议，完全是以日本立宪运动为依归，康有为曾明请光绪有‘以俄大彼德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的话，盖维新运动方开始的时候，康梁等与日人往还甚厚。伊藤博文恰好当时来华游历。英教士李棣

① 张允起 《宪政、理性与历史 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 刘振铠编著：《中国宪政史话》，（台北）文海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吴松等点校，第一集，第547页；第二集，第771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太摩 (Timohy Richard) 曾向康建议转请政府聘伊氏为首相, 可见当时日本立宪运动在一般士大夫的心目中, 是如何的向往了”^①。但戊戌维新运动最终一无所成, 而康梁等士大夫所追求的政制变革, 也只是在皇权制度框架下的君主立宪而已。

孙中山关于国体变革的思想亦形成于该时期。然有研究认为, 1890 年前后“孙中山在政治抱负上并没有超乎社会改革的理想”。其例证主要是孙在《上李鸿章书》中政治主张的重点是“欧洲富强之本, 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 而在于人能尽其才, 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 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 富强之大经, 治国之大本也”等经济改革方面, 据此, 便认为孙中山对社会变革的关注“仍是实业的层面, 尚未涉及政治层面”。^②似乎当时孙中山的政治抱负尚未及康梁等士大夫, 甚至仅停留于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派观点, 此确实有点让人不解。其实以当时的局势, 既然孙中山的上书对象是李鸿章, 李本制度内人士, 因而就中策略性地回避其他观点也属情理中事。而据孙中山本人所言: “予自乙酉 (光绪十一年, 1885 年) 中法战败之年, 始决倾覆清廷, 创建民国之志, 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 借医术为人世之媒, 十年如一日。”“至甲午 (光绪二十年, 1894 年) 中东战起, 以为时机可乘, 乃赴檀岛、美洲, 创立兴中会, 欲纠合海外华侨, 以收臂助。”而“乙未 (光绪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1895 年 10 月 26 日), 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可见当时孙中山应是较为激进的革命者, 以致“闻吾言者, 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 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③。之后亦有评论道: “当孙中山在 1895 年发动第一次起义的时候, 人们都认为, 他就算没有发疯, 至少也是个无知的狂热者; 但当他在 30 年后逝世时, 他已经被视为有远见的民族主义领袖, 受到了广泛的纪念。”^④ 也就在孙中山 1894 年组织成立的兴中会宣言中, 尽管没有明确提到清朝政府, 但其所言: “中国积弱, 非一日矣! 上则因循苟且, 粉饰虚张; 下则蒙昧无知, 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 剪藩压境, 堂堂华夏, 不齿于邻邦, 文物冠饰, 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 ……用特集会众以兴中, 协贤豪而共济, 抒此时

① 刘振铠编著《中国宪政史话》,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0 年版, 第 8 页。

② 牛彤:《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 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7 页。

③ 孙文:《有志竟成》, 载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 下册,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④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李恭忠、李里峰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39 页。

艰，莫我中夏。”而“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①等语，显然均针对清朝政府而发，由此，亦有人认为：“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宣言，是孙中山共和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②

1905年前后，是关于中国宪政与政体制度讨论最多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初的庚子之变，其不仅使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殖民统治的程度加剧，也使国内矛盾越发尖锐，进而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而宣布了所谓的“晚清新政”。晚清实施的新政不仅包括经济等实业方面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提出，也包括预备立宪等政治层面的改革内容。而根据西方的经验，时人多认为预备立宪，着力点应在培植国民参政的基础上，即实行地方自治。如康有为在清末变法奏章中曾称：“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于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③严复亦指出：“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④立宪派代表梁启超也认为，要刷新政制，“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而最切中国当今急务”^⑤。而其时，就连僻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也随处可见关于“新民”与“自治”的理论宣传，如1905年创刊的《云南杂志》，所刊载有关这方面的论点亦有：“论地方自治之精神”、“造就国民说”、“国民的国家”、“论中国国民之劣性”、“国民的国家观念”、“论国民之责任”、“滇人之愤激及地方自治思想之发达”等文，^⑥根据当时云南人对国内局势的态度，其时评曰：“滇人士愤滇吏之昏昧误事贪庸卖国，非常愤激，有慷慨流涕到处演说者；有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者；有作为书报自行出资印刷送人者（滇省著作物非常发达，但其中以送人者为多）。且皆知各文明国皆

① 孙文：《兴中会宣言》，载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牛彤：《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③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1898年1月29日），载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页。

④ 严复：《原强》，《侯官严氏丛刻》，载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页。

⑤ 《公民自治篇按语》，《新民丛报》第5号，转引自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⑥ 参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政治部分。

以地方自治而强，以故地方自治之思想甚发达，各会皆以此为第一目的云。”^①可见晚清提出预备立宪，并采取地方自治方略，在社会上已是早有理论和舆论宣传准备了。不仅如此，“实际上，地方自治在清末的最后几年已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国策，而且地方自治普遍推行于全国各地，也是在清政府由上及下的倡导之后”^②。因而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关于立宪与地方自治等思想，由于长期的理论宣传，以及经历了戊戌变法和之后清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形势而勉强推行的新政，其无论在思想或是实践的层面，均起到了使民主思想在民众中不断普及的作用，从而也为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选择民主共和国体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基础。

然民国建立以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和妥协，政权落入前清实力派人物袁世凯手中，尽管孙中山在让出总统职位时，为约束袁世凯的政治权限，曾以国会的名义制定了有关于国体过渡时期的临时约法，但一旦政权巩固，帝制派便蠢蠢欲动，试图篡改约法恢复帝制。正如列宁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就曾认识到：“各国通过资产阶级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是极其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一定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③事实没有出其所料，因为在民国建立之后，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年由云南首义的护国运动，在中华民国建国史上可以说起着拨乱反正的关键作用。尽管此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已经察觉，并曾发起过二次革命，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缺乏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以致惨遭失败。但到1915年，其情况已大不相同，首先袁政府为获得帝国主义支持，与日本签订试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就已激起国人的极大愤慨；与此同时，“筹安会”的设立并运作，则成为直接的导火索。从而，当蔡锷、唐继尧等领导云南护国军提出“倒袁护国”时，短短几个月便一呼百应，对时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6—87页。

②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③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8页。

首先,云南护国首义使袁世凯称帝的合法性遭遇挑战。此前,当袁世凯积极筹备称帝时,尽管时人亦有异议,但在帝制派的打压下,尤其有“二次革命”被镇压的前车之鉴,初期各派别及地方势力也都在表面上进行附和。如载:在“黔省决定国体投票”中,由各县初选“出代表八十一人……开票后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议推袁世凯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①。而广东对“全国国民代表票数一律赞成君宪”,亦“于月之十三号下午四点半钟一律悬旗结彩表示祝贺之”^②。之后,当蔡锷等起兵时亦曾有言:“云南漾电^③到京之前三日,唐继尧尚有一电到京,与漾电词旨极端相反,政事堂通电所谓事隔三日,背驰千里。”^④其时,袁世凯等为复辟帝制而大耍两面手法,形式上通过成立所谓的“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议院请愿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解决国体问题,并指挥各省“代表”就地投票以体现“民意”等做法,^⑤来骗取人们对帝制合法性的认同。然云南护国运动的发起,则使其皇帝迷梦惊醒,也使袁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如报载:“云南广西反对帝制勃发消息,或其电报为政府方面措勒,或系叛军止其电报,致无从得消息之法。据外国人方面本日接到广东电报,谓广东目下犹无如斯形势,惟反对之气势已十分澎湃。”^⑥可见,尽管当时信息沟通存在阻滞,护国起义的消息尚不确切,但广东地区的民众已经开始呼应。

其次,义旗所指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周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加之不同地区的起义运动,对袁政府造成重大威胁。北京政府对云南护国军起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欲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即乘“南方不稳之防备,决定急派守备北京之第十师第三十九团及第四十九团南下”^⑦。而此时,云南所组成的护国军由蔡锷率领,统共3130人,分三梯队,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出发时所带饷糈,不够两个月的伙食津贴之用。“假使不得他省的响应,护国军的前途,甚不可知。”^⑧但在北军于四川对云南护国军进行围堵

① 《申报》，1915年12月3日。

② 《申报》，1915年12月20日。

③ 唐继尧等劝袁世凯取消帝制并限答复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页）。

④ 《申报》，1915年12月31日。

⑤ 参看葛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⑥ 《申报》，1915年12月23日。

⑦ 同上。

⑧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的过程中,由于周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各地起义运动频发,^①以及海外华人的支援,^②使云南护国军的声势迅速壮大。有如研究所指出:“护国军本身的力量虽然不强大,但既然举起讨袁的旗帜,配合上全国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对袁世凯便成为重大的威胁。”^③

再次,随着护国运动声势的不断扩大,各国皆考虑自身利益,袁对外借款受阻,袁政府失去外国势力的支持。研究认为,1913年孙中山所领导反袁之“癸丑赣宁之役,袁氏所以战胜民党的,全在帝国主义的大借款”。^④而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改变,欧战发生,英等帝国主义对中国无暇顾及,加之对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亦有疑虑,因而害怕由帝制问题导致政局不稳而使原有利益格局重组。据报道,在护国运动发生后,其时北京政府与美俄日英几项借款之商议即受阻滞,报道认为该“各端均为外交上最重要之事宜,恐在二三个月内尚未易完全解决”^⑤。而欧战后在华势力执牛耳者之日本,对袁及反对派的态度亦视双方力量之消长而变,当看到反对派力量逐步壮大时,便开始与云南方面联络,消息传出后曾受袁之责问:“日本政府秘密派员到滇是何用意?”与此同时,又“曾有某某两公使亲赴外交部与陆国务卿会晤,为口头之谈判,曾质问中央政府究能以若干时日平定西南各处之乱事,以维各国之商业”^⑥。而在护国运动初期,云南曾对各国发出通告:“独立军维持共和之宗旨,并恳请各友邦对于南北战争严守中立。”并对护国运动之前“中国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协议契约等件均承认有效。独立军管辖以

① 1916年1月24日贵州宣告独立;3月中旬广西宣告独立;4月7日广东宣告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告独立;之后是四川、陕西等宣告独立,以及肇和军舰、山东民军、江阴吴江、福建护国军等起义运动(参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488页)。

② 如(1)云南在护国运动之初,即有致华侨两电,一是“述起义之理由”;二是“乞协助军费”(《申报》,1916年1月20日)。(2)“李烈钧从海外带来数十万元,是华侨张木欣(云南腾越人)慨然借助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03页。](3)据各国公使通过本国调查,“留日美两国华侨者大概相同一致主张,推翻帝制还复共和。”“留法法国华侨者颇有种种反对帝制之议论,惟尚无若何确定。”(《申报》,1916年1月20日)(4)孙中山亦“特派冯君自由前来南洋、澳洲等处,宣布国内进行情形,筹集巨款”(《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5页)。(5)据载“此次滇黔起义实为名正言顺,不惟国内同胞竭力赞助,即海外华侨对于筹饷购械亦极热心协助,近又有华侨捐助军饷数十万运抵越境,昨晚已运抵省城,约载牛车十余辆。”(《申报》,1916年7月14日)

③ 葛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④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⑤ 《申报》,1916年1月18日。

⑥ 《申报》,1916年2月14日。

内之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完全保障。在帝制问题发生以后中央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协议契约等件均不承认。独立军发见以战时禁制品输送于中央政府者，直行没收之。凡有援助中央政府之外国官吏及商人等，独立军均视为极端反对之人”^①。其回应是及时的，紧接其后的记载是：“驻法胡公使密陈驻在国政府开议，已承认云南独立，对于唐蔡之要求亦一律表示承诺。”^②基于如此之国际国内背景，1915—1916年之交，各在华国家均对帝制予以反对并对袁政府发出多次警告，^③“袁氏卖国的外交于是全然失败，帝制的成功遂以无望”^④。

最后，逼迫袁政府步步退却，帝制丑剧终被制止。处心积虑称帝的袁内阁，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帝制念头的，因为它代表着受中国两千多年皇朝思想浸淫，并能获有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保守势力的政治主张。因而在护国运动发生之初，如前所述，北京政府当即考虑的是如何将其剿灭在事态扩大之前。而面对反对声浪逐渐扩大的态势，才不得已于1916年2月提出了“帝制延期”，^⑤即称帝时间往后推，但实行帝制依然是早晚之事。其后由于形势进一步紧逼，3月初才有“取消帝制”之说，即商议“取消年号及恢复共和”，但“究能见诸实行与否尚难预料”。^⑥以致外电亦将“筹备总统问题”之明令称为“官样文章之敷衍”。^⑦护国军显然并未被蒙骗，仍在激战之中，迫不得已，3月27日据英文京报载，“总统府会议元首正式宣告取消帝制”。^⑧但此时“帝制取消于南方时局（已）毫无显著之效力。闻黎段徐联名电告南方领袖，以帝制已撤消南方所要求之一重要条件已经遵办，双方宜暂停干戈，以待和平解决”^⑨。其时评曰：至此，“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⑩但此时南方反对派认为，取消帝制仅是条件之一，还有其他两个条件是“恢复约法”和“袁

① 《申报》，1916年1月28日。

② 《申报》，1916年2月16日。

③ 参看《申报》，1916年3月26日。

④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⑤ 参看《申报》，1916年2月12日。

⑥ 参看《申报》，1916年3月8日、9日。

⑦ 《申报》，1916年3月27日。

⑧ 同上。

⑨ 《申报》，1916年3月30日。

⑩ 《申报》，1916年4月18日。